

新旧混杂的生命样态

——文化冲突与融合语境中的郁达夫

赵艳花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新旧混杂的生命样态

——文化冲突与融合语境中的郁达夫

赵艳花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结项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混杂的生命样态：文化冲突与融合语境中的
郁达夫 / 赵艳花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215-08974-7

I. ①新… II. ①赵…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
- 人物研究②郁达夫(1896~1945)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545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6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邦克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21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郁达夫的自我想象.....	10
第一节 亦真亦假的自我书写	11
第二节 来自西方的认同对象	15
第三节 来自本土的认同对象	38
第四节 自我想象的结果	45
第二章 传统与现代:郁达夫的知识分子品格.....	52
第一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60
第二节 传统生活方式的实践	73
第三章 欲望与救赎:郁达夫的情欲观念.....	94
第一节 书写情欲与西方资源	98
第二节 情欲与救赎.....	117
第三节 救赎之途:儒家自省与基督教忏悔	128
第四节 心灵化的情欲反叛 ——兼与张资平比较.....	135
第四章 天使与妖妇:郁达夫的性别意识	142
第一节 男权意识影响下的女性类型化想象.....	149

第二节 性爱的偏枯·····	166
第三节 灵与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惑·····	171
结 语·····	183
参考书目·····	186
附 录	
难以挥去的死亡阴影	
——基督教罪感意识影响下的张资平恋爱小说·····	198
张资平恋爱小说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206
后 记·····	213

引言

惟有以 20 世纪的世界性文学交流为背景,才可能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的历史形象,才可能追溯到他们的思想、情感、信念、胆略和理想的源泉。^①

(一)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②这是鲁迅对 20 世纪初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过渡性特征的形

^① 曾逸:《导言·论世界文学时代》,见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 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44~345 页。

象描述:现代与传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并存与对峙,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混合着多种性质的奇特的社会存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利用先进的物质文明与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外力的催迫下,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变,西方资本的大量输入与刺激使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上海等完全现代化的大都市,与依然延续着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方式、偏僻闭塞的内地农村同时并存。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展示出来的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使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与不足,学习西方成为唯一的出路。从器物层面学习不行,转到制度层面的学习,从制度层面学习不行,转到思想层面的学习,20 世纪初,西方文化以强烈的气势席卷中国大地,五四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开始了彻底改造与颠覆传统文化、建构与确立新文化的伟大工程。然而,“在‘五四’这样观念急剧变动,人们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时期,受历史之命去实现这种变革的人们自身,却不可能如所期望的那样一下子脱出与既往历史的联系,相反,因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因其精神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倒往往使历史的承续性在更深的层次完成了”^①。过渡时代的巨大投影笼罩了五四时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使这些领域以各种形式显示出新与旧混杂的过渡性特征。

文学领域也不例外。赵园先生曾经提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代人”这一说法。所谓两代人,也就是“郁达夫所属的五四一代,与三十年代从事创作的那一代,后者又主要指属于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代”^②。与 30 年

① 赵园:《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35 页。

② 赵园:《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33~34 页。

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五四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更多蜕变的痕迹,也承受着更多转型时代的矛盾与痛苦。他们企图以极端的方式截断自己与历史的联系,却又因身处其中而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留下的阴影,因为“他们被赋予了双重身份:旧时代为自己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同时又是新时期为自己造出的第一代知识者,他们的文化教养是双重的。何止‘文化教养’,他们的整个生命都被历史分割着”^①。在社会学理论中,他们被称为“过渡人”。

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冷纳(Daniel Lerner)认为,处于转型期社会的“过渡人”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一方面,“过渡人”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由于转型期社会是“新”与“旧”的混合物,处于“新”“旧”两个价值系统夹缝中的“过渡人”一只脚踩在新的价值世界里,另一只脚还留在旧的价值世界里,因此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从积极的方面讲,他对“新”的与“旧”的都有一种移情之感;从消极的方面讲,他对“新”的与“旧”的也都有一种拒斥之情^②。他们正在与传统社会文化相揖别,但又未能完全走出传统的阴影,他们向往未来,并已滋生了一系列未来理想新人的因素,却又在客观上与未来文明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正在过渡中”的时空定位使过渡人必然具有两项基本特征:“一是动态性,即他们正不断地从传统向现代向未来变动;二是新旧因素的交织性,即他们在过渡期中,始终是新旧各种人格因素并存于一身,在不断的冲突中进行着人格的转型。”^③也就是说,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他们体现了一种从

①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页。

②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p165.

③ 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传统到现代的走向；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他们身上同时具有相互冲突的“新”与“旧”两种特征。

作为 20 世纪初中国转型期社会的“过渡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不只是“新”与“旧”之间的冲突，还是“中”与“西”之间的冲突，旧和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命题互相纠缠、重合，使他们在选择时倍感艰难，“价值的困窘”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整体性的冲击，不仅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世界观从根本上遭到质疑。旧有的传统认知模式不能够解决现实和意义层面的危机，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与建立新的观念体系，西方文化成了他们反思和改造社会的某种参照系统。然而，这种异质文化的输入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坚船利炮裹挟而来的，它在政治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延续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历史性的悖论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选择时呈现出非常复杂与矛盾的心理状态，造成了他们内心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

他们在“新”、“旧”、“中”、“西”之间始终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要扬弃传统的价值，因为它是落伍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接受西方的价值，因为它是外国的，具有侵入性的。他们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需要，是现代性的要求，是一种现实理性的驱使，因此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同时，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依恋与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对不仅在政治、军事与经济层面，而且在文化思想层面具有绝对霸权的西方充满敌意。因此，他们对“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都有相当的倾向性，又对二者都有一定的排斥性，结果只能在二者之间矛盾犹豫、难以取舍。于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等多组对立两极之间不断冲突，又不断重叠，并最终形成一种互相纠缠的胶着状态。

(二)

1895~1920年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①,与郁达夫知识积累与文化心理形成的青少年时期(1903~1923)几乎完全重合。作为中国最后一代私塾学生,再加上家庭的影响,郁达夫比较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他也接受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并且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当时已经西化的日本亲身经历“欧风美雨”的沐浴。他的心理、思想与文学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夹缝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1913年,十七岁的郁达夫赴日留学,“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②。这是一个应该被牢记的时间点。之前,郁达夫除了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进行学习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外来的文学与文化。对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的林纾等人的翻译小说郁达夫根本不屑一顾,他将这些小说与礼拜六派前身的肉麻小说相提并论,自称“一本也没有读过”^③。从六岁入学到出国之前的这段时期郁达夫的阅读书目是:在富阳县立高等小学课余阅读了四史和唐诗古文;小学毕业那年暑假读了《石头记》和《六才子》;在杭州上中学时读了中国传统小说《西湖佳话》和《花月痕》;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喜欢的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最爱读的两本戏曲是《桃花扇》和《燕子笺》;十七岁前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自述诗》中他曾写道:“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忽遇江南吴祭

①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二十一世纪》(港)1999年4月号。

② 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26页。

③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77页。

酒，梅花雪里学诗初。”在诗的批注中有如下文：“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余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①在家自修期间，除了早饭前读一小时的英语，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两部《唐宋诗文醇》以及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对他影响最大的三部书是吴梅村的《吴诗集览》、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与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记》。显然，“当时代在变化，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不稳定进程中时，郁达夫依然是以往那套传统的思维范畴”^②，他接触并沉醉于其中的仍然是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学作品。通过它们，郁达夫掌握了一个中国文人作文写诗的基本能力，他钻研过王阳明的“心学”，钻研过《沧浪诗话》《白香词谱》等诗话词律，从“九岁题诗四座惊”到去世他几乎没有停止过旧体诗的写作，这些诗的数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散文和政论，其诗艺的娴熟、精湛，在现代作家中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有论者认为其诗歌成就远在其小说之上。通过对传统典籍的阅读，郁达夫不仅形成了最初的文学兴趣，同时，他也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

在赴日途中，郁达夫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这是他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初次接触，也是他对现代文明的第一印象。面对与家乡富阳完全不同的大都市灯红酒绿的夜景，十七岁的他感到“不安与迷惑”。到了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冲击更使他成为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③。在以日本留学生生活

①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有序》，《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45页。

② 〔美〕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节译）》，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533页。

③ 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94页。

为题材的小说中,郁达夫的自传体主人公不断表现出因为生活在陌生文化环境中而产生的文化震惊与不适感。当时正值日本的大正时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十九世纪文化的结晶,自然主义中的最坚实的作品,车载斗量地在那里被介绍”^①。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②。仅在高等学校的四年中,郁达夫就读了一千部左右俄、德、英、日、法等国的小说。郑伯奇回忆说:“达夫的外国文学知识也是相当渊博的……读了不少外国文学的书籍。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专读一个作家,也不专攻一国文学,凡是名著杰作,他大都阅读。甚至初露头角的作家,或者不大出名的作品,只要兴趣投合,他也津津乐道。”^③通过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郁达夫不仅了解了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更吸纳了蕴含在其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不仅是他获得具体文化知识的过程,更是在一个与之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二度形成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教养、人格气质、价值观念的过程,是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经历裂变与重铸的过程^④。1922年的郁达夫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中国,这时的他与1913年登上赴日轮船的那个郁达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① 郁达夫:《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04页。

②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78页。

③ 郑伯奇:《忆创造社》,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页。

④ 魏建:《文化中介:日本近代文化之于前期创造社》,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

然而,传统文化将近十年的教育与熏染已经使其中的思维方式、道德理想渗入了郁达夫的灵魂,虽然在日后遭遇到的现代文化面前,这种影响似乎不堪一击,被迫退守到他思想的一隅,但它却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与文化心理结构永远潜藏在了郁达夫的内心深处,它限定着郁达夫吸收西方文化的内容与方式,也规定了郁达夫接受西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它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重新占领灵魂的中心位置。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时,郁达夫随身带着“几册线装的旧籍”,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跟随他远渡重洋的象征,虽然留学日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与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显然已经预先为他的思想赋予了底色,那一身“半新的夹服”,正是他作为最后一代比较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表征:半新半旧。

对于郁达夫的文化选择这一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课题,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从具体的文学文化影响入手,截取郁达夫与中外文化的某一个侧面进行探讨,例如他与佛教的关系、他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等等,将郁达夫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现象与生命现象放到中外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背景中,考察其文化选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和文章还不多见。赵园先生曾经在《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一文中从审美态度、人生态度、文学观念、思维方式四个方面入手,试图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现代’与‘传统’错综重叠之中的郁达夫”^①,由于篇幅所限,她的描绘还没有使郁达夫的文化心理特征得到深入、全面、系统的开掘与呈现。

郁达夫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夹缝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

^① 赵园:《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3页。

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西方文化引导他突出过往历史的重围,而传统文化却又召唤着他不断回归,这使他的心理、思想与艺术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中与西、新与旧混杂的特征。因此,只有将郁达夫放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下,从最能突出郁达夫个性的方面切入,通过对他的文本现象与生命现象的分析,考察这些方面新旧混杂特征的形成与样态,才能厘清他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选择、看取与扬弃,还原出一个具有内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郁达夫。

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他确立的自我形象和他对两性关系的书写,那么这两个方面就成了考察他文化选择的最好切入点。其中,研究郁达夫的自我形象要求我们从两个路向来进行:文学形象与社会形象,原因是文学文本中的“郁达夫”和作为社会角色的郁达夫几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虽然他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前者有更多的虚构色彩,而后者则相对真实。因此,本书将“他们”分开进行论述。第一章着重揭示小说、散文、日记、自传等文学文本中郁达夫自我形象的中西文化渊源,第二章主要分析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的郁达夫在中西文化影响下认同的不同角色。在郁达夫对两性关系的书写中透露出来的是他对性本身和性的对象的态度,因此,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在东西文化影响下的郁达夫的情欲观念和性别意识。

本书的目的即是以前人在郁达夫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自我形象、知识分子品格、情欲观念、性别意识四个方面来探析中外两种异质文化在郁达夫内心的融合与碰撞,解读 20 世纪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艰难选择。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 郁达夫的自我想象

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自我表现风潮,当时的作家不仅利用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方式进行文学创作,还竞相出版自己的日记、书信、自传,对自我的书写一时成为文坛风气,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等人都曾经参与其中。然而,在这些作家中,似乎没有谁能像郁达夫那样对描写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持续的需求,他不仅是将个人经验文学化的始作俑者,更在 20 余年的文学生涯中自始至终地贯彻了他“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①的主张。郁达夫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写他自己,作品中处处活动着作者的影子。在他的全部小说中,自叙小说可以占到八成甚至九成,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从 1921 年《时事新报·学灯》上的《羌城日记》始,到 1937 年《青年界》上的《回程日记》止,郁达夫公开发表的日记至 20 余万字。在《奇零集·日记文学》中,他强调:“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

^①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3 年版,第 180 页。

说明日记对于他不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事手段,而是一种特殊的文体。30年代,郁达夫又在《人间世》和《宇宙风》上发表了《悲剧的出生》等一系列自传,用饱蘸深情的笔触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日本留学初期的生活,它们不像是对自己经验的简单记述,更像是一篇篇优美而意味深长的散文。郁达夫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不仅证明了“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也证明了作家的自叙传(包括日记和自传)同样可以是文学,是一种将个人生活文学化、“自我”形象化的手段。他的小说、传记、日记都在塑造、确证与发展一个超越作者本人的连贯的自我形象。自传形式的运用往往使读者将郁达夫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等同起来,而作者在写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误解,“不断进入自己的自我形象”^①,使他个人的生活具有了公共的价值。但这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者自我想象的产物,具有极大的虚构性。关于这一点,李欧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中已经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在本章中,笔者将以此为基础,具体分析郁达夫的自我对中西方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这一自我在叙述中的形成。

第一节 亦真亦假的自我书写

从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开始,郁达夫对自传体文学的追求就开始了,将“一己的体验”如实率真地表现出来,成了他一贯的创作态度,几乎所有的小说主人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作者外在或内在的特征。他们一般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是眼泪呢还是醉意,总之他

^① [美]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节译)》,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581页。

的眉间,仔细看起来,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①。如果我们把这副肖像与现存的郁达夫青年时代的照片作一下比较,会发现它简直就是作者的自画像。不管是《南迁》里的“伊人”,《沉沦》里的“他”,《茫茫夜》《秋柳》里的“于质夫”,还是《烟影》《东梓关》里的“文朴”,还是很多散文、诗词和日记里的“我”,这些人物有着与郁达夫相似的人生经历,通过小说、散文、自传、书信之间的相互印证,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些人物的某些生活细节甚至与郁达夫完全重合,例如《南迁》关于主人公伊人的家庭和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中的回忆完全一致:“他的家庭里只有他的祖母是爱他的。伊人的母亲,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太早,所以竟变成了一个半男半女的性格,他自小的时候她就不知爱他,所以他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厌世忧郁的人。”^②《怀乡病者》中于质夫对初恋的回忆与郁达夫在《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中和赵家少女月下相对的情境如出一辙。不仅如此,这些人物的内在气质也与作者基本吻合:他们忧郁怯懦、敏感多疑、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在生人尤其是女性面前因害羞而显得十分窘迫和尴尬,同时又富有才华,言行风度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这一系列人物从内外两方面反映出了整体的郁达夫,他们的人生经历构成了郁达夫的整个人生轨迹,他们的内在气质从不同侧面折射出郁达夫的性格特征。从《沉沦》时期敏感多疑、怯懦忧郁的青年忧郁病患者,到《茫茫夜》时期愤懑偏执、荒唐自戕的颓废派文人,再到《迟桂花》时期尘埃落定、气定神闲的中年文士,勾画出郁达夫由激烈归于平静的整个人生图景,而

^① 郁达夫:《茫茫夜》,《郁达夫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17页。

^② 郁达夫:《南迁》,《郁达夫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60页。